

THE WORLDWATCH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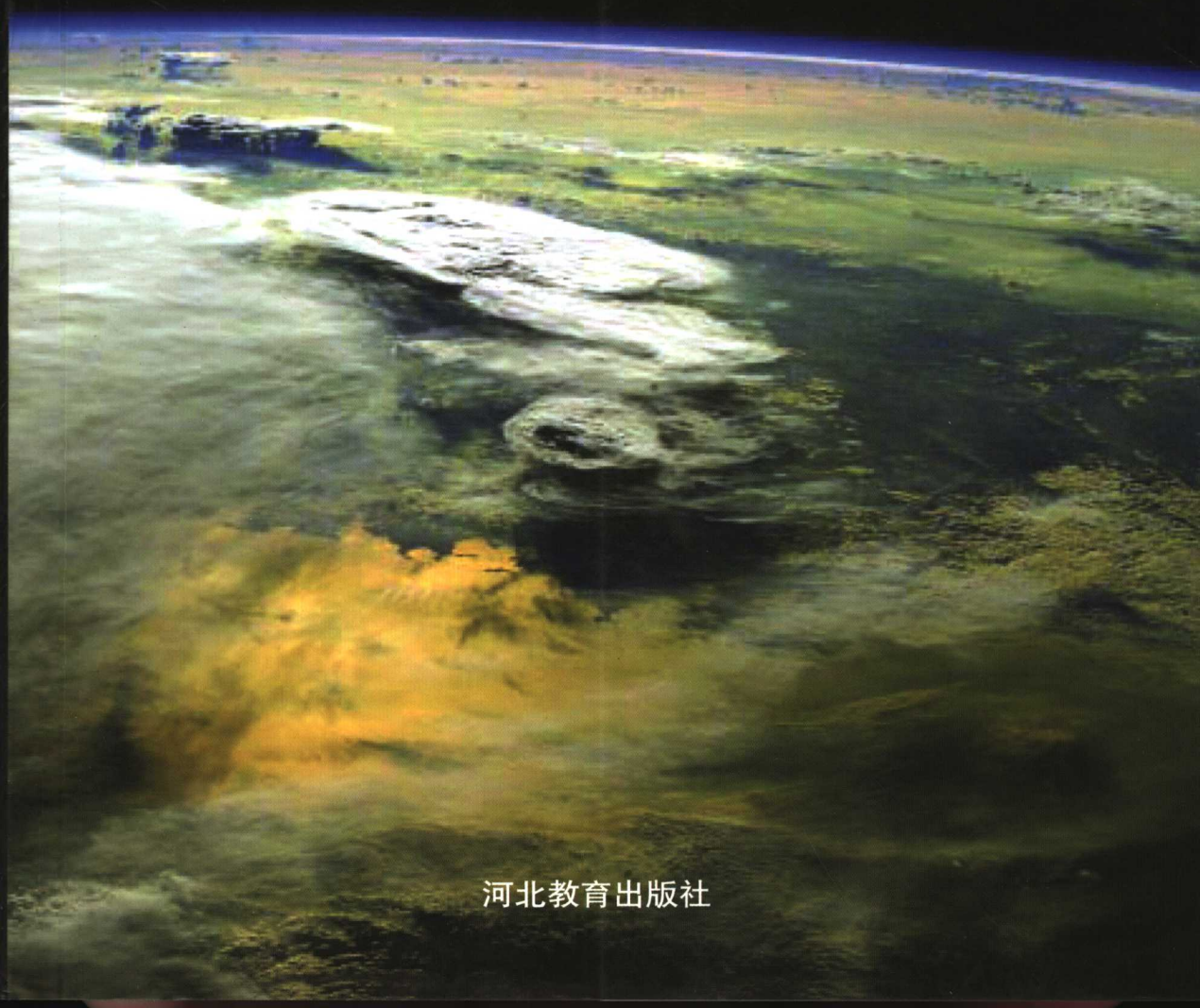
世界观察研究所 编

曹建海 邓文锋 等译

世界报告 2006
STATE OF THE WORLD

中国与印度
CHINA AND INDIA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观察研究所 编

曹建海 邓文锋 等译

世界报告2006

STATE OF THE WORLD

中国与印度

CHINA AND INDIA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报告. 2006, 中国与印度/世界观察研究所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5
ISBN 7-5434-6152-8

I. 世... II. 世... III. ①生态环境—研究报告—
中国—2006②生态环境—研究报告—印度—2006
IV. X1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972 号

State of the World 2006

Copyright © 2006 Worldwatch Institut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Hebei Educ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5434-6152-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世界观察研究所是世界知名的环境与社会政策研究机构，1974年由环境与人口问题专家莱斯特·R. 布朗创办。独特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全球视角和通俗易懂的文章使世界观察研究所成为环境健康和社会公正的发展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研究机构。

中国和印度的飞速发展吸引了全球目光，他们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然而第三世界的崛起再次引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再次被激发。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本书重点关注的内容。具体包括食品安全、淡水生态系统、生物燃料、纳米技术、汞污染防治、全球贸易编织的环境网等相关论述。



三辉图书

策 划 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刘 辉
特约编辑	李志卿
装帧设计	林 涛

课题主任 丹尼尔·尼伦伯格
埃里克·阿萨多里安 吕志
迈克尔·本德 彼得·马克森
洛里·布朗 桑德拉·波斯特尔
佐薇·查菲 迈克尔·伦纳
阿伦·科斯比 珍妮特·萨文
克里斯托弗·弗莱文 霍普·尚德
加里·加德纳 彼得·斯泰尔
琳达·格里尔 珍妮弗·特纳
苏珊娜·亨特 凯西·乔·韦特
戴维·伦纳特
编 辑 琳达·斯塔克

致 谢

丹尼尔·尼伦伯格(世界观察研究所课题主任)

在过去的 23 年里,每年的 1 月,世界观察研究所都出具一份报告,论述社会所面临的环境和社会挑战,以及世界在应对这些问题方面的进展情况。多年来,有些挑战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没有改变:没有研究所内外许多人的帮助,我们是永远写不出《世界报告》的。在分析这些紧迫问题并向关心未来的人们通报分析结果方面,无论世界观察研究所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多亏了许多人的支持、鼓励和意见。这些人都值得我们真诚地说一声“谢谢”,感谢他们对《世界报告》的第 23 版作出的贡献。

首先,我们要感谢各个基金会,它们的支持维持并激励着研究所的工作。提供支持的有:美国可再生能源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Renewable Energy, ACORE)、布莱蒙基金会(Blue Moon Fund)、古德曼基金/古德曼环保奖(Richard & Rhoda Goldman Fund/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凯洛格基金会(W. K. Kellogg Foundation)、里尔基金会(The Frances Lear Foundation)、路佛家庭基金会(Steven C. Leuthold Family Foundation)、马萨诸塞州技术合作机构(Massachusetts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默克家庭基金(Merck Family Fund)、欧弗布鲁克基金会(The Overbrook Foundation)、拉斯马森基金会(V. Kann Rasmussen Foundation)、洛克菲勒兄弟基金(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罗斯查尔德基金(A. Frank and Dorothy B. Rothschild Fund)、共享地球基金会(Shared Earth Foundation)、谢南多厄基金会(The Shenandoah Foundation)、浪潮基金会陶波社区基金(TAUPO Community Fund of the Tides Foundation)、联合国人口基金(U. N. Population Fund)、华莱士基因基金会公司(Wallace Ge-

netic Foundation, Inc.)、华莱士全球基金(Wallace Global Fund)、约翰内特—沃勒斯坦研究院(Johanette Wallerstein Institute),以及温斯洛基金会(The Winslow Foundation)。我们还要感谢一些政府机构的协助,包括挪威王国外交部(Norwegian Roy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和德国政府下属的德国技术合作学会(German Society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还有许多支持我们的其他人,没有他们,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有任何成就。我们由衷地感激研究所的个人捐助者,包括3500多位世界观察之友(Friends of Worldwatch)。他们用自己的热情来证明他们坚决支持世界观察研究所以及世界观察研究所为创建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而付出的努力。我们尤其要感谢世界观察赞助者理事会(Worldwatch Council of Sponsors)——亚当(Adam)和雷恰尔·奥尔布赖特(Rachel Albright)、汤姆(Tom)和劳里·麦克布赖德(Laurie McBride),以及雷恩(Wren)和蒂姆·沃思(Tim Wirth)——他们用自己尤其慷慨的年度捐款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始终如一的信任和支持。

在《世界报告》2006年版中,研究所再次聘请了数位才华横溢的外部作者。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桑德拉·波斯特尔撰写了有关保护淡水生态系统的那一章。ETC集团的霍普·尚德和凯西·乔·韦特阐述了纳米技术,ETC集团员工帕特·穆尼(Pat Mooney)、西尔维亚·里拜罗(Silvia Ribeiro)和吉姆·托马斯(Jim Thomas)供稿。撰写汞污染影响那一章的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琳达·格里尔、“防汞政策计划”(Mercury Policy Project)的迈克尔·本德、布鲁塞尔康科德协和东西部(Concorde East/West Sprl)的彼得·马克森和执业律师戴维·伦纳特。他们在研究方面得到了玛丽莎·布卢·斯凯(Melissa Blue Sky)和马修·弗里曼(Matthew Freeman)的协助。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阿伦·科斯基提供了有关贸易的那一章稿件。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中国环境论坛(China Environment Forum)的协调官珍妮弗·特纳和保护国际中国办事处(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hina)的吕植共同撰写

了有关中国环境领域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一章。此外,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的马克·穆勒(Mark Muller)和吉姆·克兰施米特(Jim Kleinschmidt)继续为论述生物燃料的那一章供稿。

今年,我们研究所还增加了一些新面孔。苏珊娜·亨特、彼得·斯泰尔和劳伦·索金(Lauren Sorkin)加盟世界观察研究所,研究我们的生物燃料课题。2004年作为斯坦福MAP研究生加入我们的队伍的莫利·埃克(Molly Aeck)撰写了一篇有关可再生能源和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论文,后来于10月份离开研究所,作为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去了东南亚。中国研究生刘迎玲和李梓军帮助设计了研究所网站上的“中国观察”(China Watch)新闻服务。而就在本书付印的时候,我们又迎来了副总裁乔治亚·沙利文(Georgia Sullivan)、开发助理劳拉·帕尔(Laura Parr)和行政助理德鲁·威尔金斯(Drew Wilkins)。

本书各章的作者也非常感激由研究人员和实习生组成的2005年课题小组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感谢他们找到踪迹难寻的事实、提供图表和相关资料。本·阮唐乐(Ben Nguyen Tang Le)、连江和尼兰姆·辛格(Neelam Singh)都在为第一章工作;布赖恩·尼科尔森(Brian Nicholson)用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为第三章追踪信息资料,并与萨拉·洛夫兰(Sara Loveland)一起为第三章的研究提供协助。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的琳达·埃利斯(Linda Ellis)协助研究第九章,而凯蒂·柯里斯(Katie Currus)帮助寻找第十章的资料。纳拉吉·多希(Neeraj Doshi)、霍尔格·谭(Holger Tham)、生物燃料课题助理劳伦·索金以及高级研究员布赖恩·霍尔维尔(Brian Halweil)帮助整理出了第四章。我们的全球化与政府管理课题主任希拉里·弗伦奇(Hilary French)除了审读各章的初稿外,还在寻找和招募一些重要的外部作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跟踪世界各地的文章、期刊和图书的海量工作落在研究馆员洛里·布朗(Lori Brown)的身上。此外,洛里还再次运用她收集、组织资料的出色能力,编制了全球一年大事回顾。

在初步调研和撰写工作完成后,职员和外部供稿人的内部

审读过程帮助确保我们能尽可能清晰、准确地展示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今年的一整天职员审读会议上,实习生、杂志员工和其他审读人员向作者们提出了质疑、补充和评论。

慷慨地为我们付出时间的外部专家的审读,也是今年终稿产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特别感谢以下人员提出的深思熟虑的意见和建议,以及许多人提供的信息:安德鲁·奥利斯(Andrew Aulisi)、里贾纳·贝洛(Régina Below)、迈克尔·布朗加特(Michael Braungart)、克里斯·布赖特(Chris Bright)、戴维·布鲁贝克(David Brubaker)、迈克·布龙(Mike Brune)、阿米莉亚·钟(Amelia Chung)、萨尼·科埃略(Suani Coelho)、德怀特·柯林斯(Dwight Collins)、格兰特·科普(Grant Cope)、克里斯托弗·德尔加多(Christopher Delgado)、莉莉·多格(Lily Donge)、迈克尔·杜利(Michael Dooley)、詹姆斯·埃斯特利(James Easterly)、拉尔夫·埃斯蒂斯(Ralph Estes)、特蕾西·费希尔(Tracy Fisher)、托乔恩·弗雷德里克森(Torbjorn Fredriksson)、雷迪恩·弗赖姆斯(Ladeene Freimuth)、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布鲁斯·弗里德里克(Bruce Friedrich)、卢·富尔顿(Lew Fulton)、劳拉·杰龙(Laura Geron)、朱莉·戈特(Julie Gorte)、丹·格特曼(Dan Guttman)、戴维·哈吉特(David Hargitt)、罗伯特·欣克利(Robert Hinkley)、胡京、贾斯廷·基茨斯(Justin Kitzes)、吉姆·克兰施米特、马俊、休·梅克伦伯格(Sue Mecklenburg)、哈罗德·穆尼(Harold Mooney)、阿利森·穆尔(Allison Moore)、马克·马勒(Mark Muller)、马克·奥利茨基(Marc Orlitzky)、凯特·帕罗特(Kate Parrot)、理查德·雷内尔斯(Richard Reynnells)、帕亚尔·桑帕特(Payal Sampat)、德巴拉蒂·萨皮尔(Debarati Sapir)、拉德希卡·萨林(Radhika Sarin)、保罗·斯科特(Paul Scott)、保罗·夏皮罗(Paul Shapiro)、萨拉·斯坦迪什(Sara Standish)、马克·斯塔里克(Mark Starik)、伊丽莎白·斯图肯(Elizabeth Sturcken)、安妮·思拉普(Ann Thrupp)、弗兰克·托特里茨(Frank Tortorici)、鲍里斯·厄特里亚(Boris Utria)、梅格·沃希斯(Meg Voorhes)、马西斯·瓦克尔纳吉尔(Mathis Wackernagel)、戴维·沃林格(David Wallinga)、博文、安杰莉卡·沃茨(Angelika Wirtz)、格雷戈尔·沃尔布林

(Gregor Wolbring)、特里·沃伦(Terry Wollen)和吴逢时。

每一章的进一步加工是细心的编辑琳达·斯塔克的工作。琳达担任世界观察出版物编辑已有多年历史,从而确保我们能够将初稿最终转变成经过仔细推敲后的各章——而且是在她确定的最后期限之内。

在编辑、修订完成后,艺术主任莱尔·罗斯博萨姆(Lyle Rosbotham)技术娴熟地精心设计每一章和事件时间表。里奇·波普(Ritch Pope)编制了文献目录,再次协助最后的生产过程。

要让《世界报告》到达读者的手中,写作部分仅仅是个开头。这个任务接着落在了我们的尽心尽力的公关部身上。他们的努力涉及多个战线,以确保《世界报告》信息在我们的华盛顿办公室之外广为传播。于2005年年初加盟研究所的公关部经理达西·雷克斯特劳(Darcey Rakestraw)领导这部分工作——为世界各地的媒体、公众和决策者精心编制通稿。协助达西的是公关部助理、总裁助理考特尼·伯纳(Courtney Berner)。2005年秋季,考特尼成了世界观察开发小组的副经理。编辑主任汤姆·普鲁格(Tom Prugh)和高级编辑莉萨·马斯特尼(Lisa Mastny)筹划《世界观察》杂志未来几期的工作,而我们其他人则全心编制本书。

我们还要深深感谢网络经理史蒂夫·康克林(Steve Conklin)的勤奋工作。他运用自己的技术经验和创造力,制作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网站。我们的信息技术管理队伍——来自“包罗万象”(All Covered)公司——在拉兹·梅尼(Raj Maini)的指挥下,确保了办公室内外信息流动畅通无阻。

这一版的《世界报告》还在扩大了的合伙人网络中发起了一次范围更广的活动,以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我们要特别感谢在该活动中与我们合作的机构,包括布来蒙基金会、全球环境研究所(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以及许许多多计划在今后几年里与我们合作的其他机构。

除了这些新建立的关系外,还有许多长期的合伙关系多年来加强了世界观察的力量。我们之所以能够以22种语言、在27个国家发行《世界报告》,完全是因为有了我们全球出版网络的

协助。这些出版商、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人为我们的调研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以及翻译、宣传和分销服务。我们对他们感激不尽,并希望特别感谢以下个人的帮助:挪威的奥斯坦·达尔(Oystein Dahle)、马格纳·诺德霍格(Magnar Norderhaug)和海伦·艾尔(Helen Eie);德国的安雅·科恩(Anja Kohne)、布里吉特·孔泽(Britte Kunze)、克里斯托弗·鲍尔斯(Christoph Bals)、克劳斯·米尔克(Klaus Milke)、伯恩德·莱因伯格(Bernd Rheinberg)、格哈特·费希尔(Gerhard Fischer)和冈特·西恩(Gunter Thien);日本的小田惣司(Soki Oda);意大利的安娜·布鲁诺·文特雷(Anna Bruno Ventre)和艾伯托·伊巴(Alberto Iba);西班牙的路易斯·加西亚·珀蒂(Lluís Garcia Petit)和马里萨·默卡多(Marisa Mercado);瑞士、法国和加拿大法语区的贝努瓦·兰伯特(Benoit Lambert);中国大陆的金女士和秦梅;希腊的依阿尼斯·萨基奥蒂斯(Yiannis Sakiotis);印度的阿尼尔·库马尔(Anil Kumar);韩国的郑沮真(Jung Yu Jin);中国台湾的乔治·程(George Cheng);土耳其的耶斯姆·埃尔坎(Yesim Erkan);乌克兰的维克多·沃夫克(Viktor Vovk);芬兰的图马斯·塞帕(Tuomas Seppä);波兰的马辛·格温(Marcin Gerwin);罗马尼亚的尤安娜·瓦西利斯克(Ioana Vasilescu);巴西的埃德瓦尔多·阿塞德(Eduardo Athayde);以及英国的乔纳森·辛克莱·威尔逊(Jonathan Sinclair Wilson)。

在美国,诺顿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在过去的23年里一直为我们出版《世界报告》。我们感谢诺顿公司及其员工——尤其是艾米·彻里(Amy Cherry)、利奥·威格曼(Leo Wiegman)、南希·帕姆奎斯特(Nancy Palmquist)、希瑟·古德曼(Heather Goodman)和安娜·奥勒(Anna Oler)。有了他们的努力,《世界报告》《生命体征》(Vital Signs)以及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其他图书才得以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和大学校园。

我们感谢主权家园(Sovereign Homestead)的朋友们,特别是马克·欣茨(Mark Hintz)、邦尼·福特(Bonnie Ford)、谢里·里德(Sherrie Reed)、特里·施万科(Terry Schwanke)和肯·福恩沃特(Ken Fornwalt),感谢他们帮助我们服务于我们的顾客和读者,解答他们的问题,填写定单,并传播我们新出版物的消息。

出版与营销主任帕特里夏·斯科帕尔·夏恩(Patricia Skopal Shyne)协调着我们与全球出版伙伴之间的合作,并为我们的营销工作带来了活力和创造力。财务与行政主任巴巴拉·法林(Barbara Fallin)继续高效而可靠地管理着研究所的日常运营,而约瑟夫·格雷夫利(Joseph Gravely)则快乐地满足着管理研究所出版物的定单和来信来函。

负责与研究所诸多捐助人联络工作的是我们尽心尽职的开发部职员:约翰·霍尔曼(John Holman)、玛丽·雷德芬(Mary Redfern)和梅里德·哈特曼(Mairead Hartmann)。当《世界报告》于秋季送到出版商那里时,我们真情告别了搬去纽约的梅里德。这个班子的幕后工作确保了研究所的正常运行。

我们尤其感激研究所董事会成员的辛勤工作和忠实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在战略规划、组织开发和资金筹集方面,给予了关键性的意见。

正是有了这里提及的所有人以及更多没有提及的人的支持,世界观察研究所才能够投入 31 年的时间来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憧憬。他们的支持给了我们巨大的希望,即有一天,全人类都会走到一起,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和平、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世界奠定基础。

最后,我们谨以此热烈欢迎最新加入世界观察大家庭的成员。高级研究员珍妮特·萨文和丈夫弗里尔·斯维里森(Freyr Sverrisson)于 2005 年 5 月生下了爱德华·芬尼安·弗里森·萨文(Edward Finnian Freyson Sawin)。正是为了芬尼安以及他的那代人,我们才致力于设法令我们这个星球更加适合居住。

序 一

解振华(前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

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 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到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保护我们大家赖以生存的环境。通过批准千年发展目标,国际社会作出了庄严承诺:要消除贫困,普及教育,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预防艾滋病,保护环境,促进全球合作。

最近几年,世界已经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环境的总体状况并没有改善。相反,它在继续恶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一些国家的贫困状况随着南北差距的拉大而加剧,工业化国家放慢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援助速度,有些国家仍然经受着没有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过度消费的磨难,面临着类似恐怖主义这种破坏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非传统型威胁。大量艰巨的工作还在前面,世界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政府已经将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战略,将环境保护当作一项基本国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加快了步伐,在我们的城市里建设了必要的环境基础设施,提高了预防和处理污染的能力,关闭了8万多个高度污染的小型企业,并提高了公众的环境意识。

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纪的时候,我们决心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我们正努力建设一个节省资源的环保型社会。一个环保型社会就是人们采取一种促进人类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4%,同时人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环境质量在有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得到改善,大部分主要污染物的排

放已经得到控制,环境方面的国际协定已经签署,环境改善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已经提高。

在此期间,政府为解决环境问题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已经证明中国政府是个负责任的政府,中华民族是个负责任的民族,中国的发展是一种负责任的发展。

在今后的 15 年里,中国的人口将继续增长,经济总增长将提高 4 倍。资源消耗将继续增长,从而给环境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最近批准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提案,为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勾画了蓝图。

保护环境、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世界各国的努力。在过去,我们得到了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中国愿意竭尽全力,促进环境保护方面的继续合作,包括与工业化国家和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双边合作。与此同时,我们将加强南南合作,以便为尽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我们的贡献。

我非常高兴看到《世界报告 2006:中国与印度》指出了中国和印度以及整个世界正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它使我们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需要发挥重要作用。我希望工业化国家能够兑现它们的承诺,提供资金和技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消除饥饿,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整个人类共同的选择和由衷的希望。

序 二

苏尼塔·纳莱恩(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主任)

在印度独立之前许多年,有人问甘地(Mahatma Gandhi)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希望解放印度的目的是否是为了使印度跟它的殖民统治国英国一样“发达”?“不”,甘地的回答令提问人大吃一惊,提问人争辩说英国是可以效仿的楷模。甘地回答说:“如果说英国要称霸半个世界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那么印度需要多少个世界呢?”

我们今天需要的正是甘地的智慧。既然印度和中国已经即将加入富国的行列,由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方面的痛苦应当令我们深思。不仅要考虑这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对我们星球的资源产生的影响,还要考虑——并且是再次重新考虑——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已经导致人口少得多的世界疯狂掠夺、破坏我们这个唯一星球上的资源。

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印度和中国极其热忱地希望效仿的西方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说,是十分有害的。它使用大量的资源——能源和材料——而且产生大量的废料。工业化世界已经懂得了要通过投入巨额资金来削减其产生财富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工业化世界从来没有成功地遏止这些影响;它们距离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还差得很远。

我们以富国城市中的地方空气污染控制为例。伴随战后时期经济增长的是竭力控制每个城市的污染:从伦敦到东京到纽约。它们对当地公众日益增长的环境主义运动作出的反应,是投资于汽车和燃料的新技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污染指数——当时是按照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量进行测量的——表明城市是清洁的。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测量科学取得了进展。科学家们确认,问题并不是颗粒的总量,而是能够渗入肠胃和循环系统的微小而可吸入的颗粒物。这些微小的有毒物

质,也就是这些可吸入的悬浮颗粒物质的关键起因,是用于汽车的柴油燃料。于是,汽车和燃料技术得到了发明。它们减少了柴油中的硫,找到了俘获汽车产生的颗粒的办法。人们相信,新一代技术已经战胜了挑战。

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的科学家如今发现,在排放和燃料技术减少了颗粒的质量之后,颗粒的尺寸减小了,排放的数量却上升了——而不是下降。这些颗粒的尺寸更小。这些被称作纳米颗粒(纳米的计量单位,等于十亿分之一米)的物质不仅难以测量,而且——科学家们说——甚至更加致命,因为它们能轻而易举地穿透人的皮肤。更糟糕的是,即便在技术减少了颗粒之后,取而代之的却是这些车辆排放的毒性相同、数量更大的氮氧化物。

但是,装点门面的是确凿的事实:工业化世界也许已经清理了自己的城市,然而它们的排放物已经置整个世界的气候系统于危险之中,使得数百万处于生存边缘的人们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更加容易受到伤害、更加贫穷。换句话说,西方不仅还在继续追逐它们自己造成的问题,而且还将发展产生的问题传输给了其他国家,传输给了相对弱势、应对该问题的能力更弱的国家。

贫穷世界如今希望采用的正是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为什么不呢?世界并没有展示还有什么其他模式行得通。事实上,它使我们明白,企业只有在寻求解决旧问题的新办法时,才能有利可图。它告诉我们,它创造财富的途径是进步;它告诉我们,它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没有商量余地。

但是,我相信贫穷世界必须做得更好。南方各国——印度、中国及其所有邻国——别无选择,只有重新设计发展轨迹。当工业化世界经过其最迅猛的发展时期时,它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如今南方各国的水平。当时,石油的价格低得多,也就是说增长的代价低许多。如今,南方各国正在采用相同的模式:高度资本密集型,因而是社会分裂型;材料和能源密集型,因而产生污染。但是,南方并没有能力进行对于公平和可持续性来说至关重要的投资,无法遏制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一条死胡同。

我们还是以空气污染问题为例。若干年以前,我所在的机构认为,德里市应该让公共交通系统转而使用压缩天然气。转